專題研究

中共意識形態的適應與調適

The Adaptation and Adjustment of Ideologies in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唐勃（Tang Paul P.）

銘傳大學通識教育中心教授

摘　要

對於中共而言，意識形態（Ideology）不僅是一種思想、學說，而且是一種運動的指針和鬥爭的武器。它既操控動態的政治運作，又建構靜態的組織體制。

中共自建黨以來，長期強調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為最高真理，但是由於中共黨內不同派系與政治權力間之糾結，乃使中共黨內意識形態之對立與矛盾瀕仍，特別是為了應付改革開放，面對新世紀的新情勢，中共意識形態遂面臨了適應與調適的重大轉折。

基本上，中共意識形態的矛盾與衝突，在適應方面有三點特別值得重視，這包含了　馬列主義的侷限性；　文化大革命的衝擊；　對外開放的衝擊。而中共意識形態調適的作法，則可以歸納為　對「階級鬥爭理論」的修正；　對「歷史唯物論」的修正；　對「理論與實際」的修正；　「三個代表」指導原則的提出。

中共意識形態的適應與調適，在鄧小平時期，一方面企圖維護馬列主義理論的權威，二方面又要維護中共統治的合法性，以取得經濟改革的成果；在江澤民時期，就是要把「三個代表」思想最終成為中共在新世紀的立黨之本、執政之基、力量之源。

對於中共意識形態的適應與調適，鄧小平所說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將是世人觀察、判斷及評估的重要指標。

關鍵詞：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意識形態、歷史唯物論、階級鬥爭論、三個代表、適應與調適、文化大革命

壹、前　　言

意識形態是一種行為取向（Behavior-Oriented）的思想體系，它在結構上包括一套相互結合的信仰體系和實踐體系，它的功能是維繫或動搖現存的社會秩序。在當代各種被稱為意識形態的思想當中，共產主義的意識形態是最高的[1]。基本上，意識形態對中共政治系統的影響是可以肯定的，它不僅包括動態的政治運作，而且涵蓋靜態的組織體制[2]。由於意識形態是在某種精密的歷史概念指導下，所形成的一套在邏輯上有一致性的符號系統，它將個人對社會環境，尤其是對未來憧憬的認知與評估，用來做為一個維持或轉變社會的集體行動的綱領。所以，意識形態在中共政治系統中成為被用來解釋和辯護社會政治制度的信仰體系，同時為這個制度的設立與發展提供綱領性的指導[3]。因此，當中共為了經濟改革，追求現代化，提出「改革」與「開放」的路線、方針與政策後，再面對新世紀全球化格局的衝擊，自然就產生意識形態的適應與調適問題了。

貳、歷史背景的回顧

自中共建黨以來，歷屆領導人無不強調應將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視為最高真理，並聲稱中共的路線、方針與政策，均係依據上述理論制訂的，而中共的每一次勝利都是馬列主義與毛澤東思想的勝利。由此可知，在思想層面，馬列主義與毛澤東思想在中共意識形態中實處於核心地位，它扮演著中共精神泉源與行動指南的雙重角色[4]。

雖然意識形態言辭的一致性，應該提供中共一個全黨統一的思想基礎，然而落實到具體的路線、方針與政策時，由於中共黨內不同派系、知識分子與政治權力間之糾結，乃使中共黨內意識形態之對立與矛盾趨於尖銳。此種情況，早期有陳獨秀的「右傾機會主義」，隨後有王明的「左傾冒險主義」；中共建政以後有劉少奇、鄧

---

1 吳玉山，「意識形態與列寧主義的國家論」，東亞季刊（臺北：第 15 卷第 3 期，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民國 73 年 1 月 1 日），頁 41-42。

2 俞雨霖，「意識形態與中共政治—論當前中共路線分歧之根源與實質」，中國大陸研究（臺北：第 28 卷第 12 期，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民國 75 年 6 月），頁 18。

3 Williard A. Mullins, “On the Concept of Ideology in Political Scienc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66. (1972), p.510。

4 吳安家，「毛澤東死後中共意識形態的演變」，匪情月報（臺北：第 26 卷第 10 期，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所中心，民國 73 年 4 月），頁 13。

小平的「走資路線」，林彪、「四人幫」的「左傾路線」，華國鋒的「凡是路線」，以及後來鄧小平在改革開放時期的「務實路線」。在前幾個落敗的路線下，所有鼓吹該路線的領導者均由政治舞台上垮下來了，然而不論他們是左是右，他們的共同語言馬列主義卻是亙久不變的[5]。

意識形態的基本內容

我們檢視改革開放時期中共意識型內容之變與不變的歷程，發現有三項要素特別值得重視。此即： 歷史意識的本質； 階級分析的概念； 行動取向的關鍵。茲分別陳述如後：

一、歷史意識的本質

歷史意識是一種意識形態產生的基礎。意識形態能得以興起，事實上是反映著社會秩序的崩潰，人們在內心中油然而生一種變革舊社會的願望，而且此願望指導著人們的行動。不僅如此，人們已認定變革舊社會是不可避免的也是不可逆轉的歷史潮流。換言之，歷史意識是一種對過去歷史的批判與反動[6]。

中共信奉的馬列主義與毛澤東思想就蘊育著深刻的歷史意識，而且深入每一位共產黨人的心裡，尤其是老一輩的共產黨人，諸如：陳獨秀、李立三、瞿秋白、陳紹禹、毛澤東、劉少奇與鄧小平、江澤民等，每一位對舊社會的批判與反動立場，可說並無二致。所以，中共領導人所擁有的歷史意識是長期持久不變的。而歷史意識對他們政治行動的影響，也深具指導作用，這就是他們深信只有馬列主義才可以「救中國」，而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7]。

歷史意識反映在政治領域的正就是當時中共領導人始終高舉「四個堅持」——堅持共產黨領導、無產階級專政、社會主義道路、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精神泉源。

二、階級分析的概念

意識形態也賦予個人認知與評價環境的能力。這也就是意識形態建構了個人的認知圖案（Cognitive Map），使個人以一種固定的角度（Perspective），包括概念與態度，來觀察世界、解釋世界，並評估環境所賦予的意義[8]。

對中共領導人而言，這種認知與評價的能力，它主要的構成部分就是階級理論。毛澤東強調的「兩條路線鬥爭」、「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三分世界理論」；鄧小平強調的「一國兩制」、江澤民倡言的「三個代表」；以及中共政治運動中經常

---

5 同註 2，頁 18-19。

6 Williard A. Mullins, “On the Concept of Ideology in Political Science”, op.cit., pp.503-507.

7 「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收錄於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三中全會以來—重要文件選編（下冊）（吉林：人民出版社，1982 年），頁 788。

8 Williard A. Mullins, “On the Concept of Ideology in Political Science”, op.cit., pp.507-509.

提出的「興無滅資」、「清除精神污染」、「反資產階級自由化」等等，都說明階級理論在中共黨內意識形態上的根深蒂固。

由階級理論構成的認知與評價能力，在與實際政治相結合時，其影響就不可避免地產生了分裂黨、分裂人性與分裂社會的意涵。這種階級分析的概念，經過中共數十年來的培養與實踐，已經形成中共由上而上的習慣性的思想方法，成為一般黨員幹部的意識形態特質和處事作風。它的功能就是無時無刻不為掀起一場又一場的政治運動提供了豐厚的社會基礎，並製造了理論上的準備。同時，它也為黨的分裂與對立提供了合法的來源，因此，中共任何政治領導人均可指責對方是屬於「資產階級」的，是必須打倒的對象[9]。

三、行動取向的關鍵

由於意識形態在政治中的另一功能，是賦予政治領導者行動的取向。中共過去一再宣稱「馬克思列寧主義是我們的行動指南」，而且就中共歷史而言，它的一切路線、方針與政策，始終侷限在它所編織的意識形態框框中，這個框框始終規範、制約與指引著中共的政治運作、社會活動的行動取向[10]。於是，中共領導人在這個意識形態的框框中產生共同的語言，這包括理想目標與基本價值觀念，所以，一旦中共發出反「右」的訊號時，幾乎所有共產黨人均有一個自然的理解，中共將採取的路線、方針與政策將會是怎麼回事了；反之亦然[11]。

事實上，中共受意識形態制約而造成的路線分歧，是不可能跳出它的意識形態網絡的。這個網絡的具體內容則是：在政治層面上強調無產階級專制、共產黨領導；在經濟層面上強調公有制與計畫經濟；在社會層面上強調建立各盡所能、按勞分配的共產主義社會；在思想層面上強調歷史唯物論與辯證唯物論。尤其是歷史唯物論，賦予了中共意識形態邏輯一致性的基礎，此即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的歷史發展軌跡，必然帶引人類進入共產主義社會。透過此種論證，中共意識形態就形成了一個自足的體系，不須外求。

---

9 魯繼人，「中共意識形態的結構與功能」，明報月刊（香港：1985 年 6 月），頁 15-18。

10 Williard A. Mullins, “On the Concept of Ideology in Political Science”, op.cit., p.509.

11 Williard A. Joseph, *The Critique of Ultra-leftism in China. 1958-1981* (Standford: stand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p.15.作者指出：中共政治中的「左」與「右」，具有兩種意義：一是解釋或合法化政治整肅；一是說明某種路線。無論如何，它們均在中共政治運作中具有客觀意涵。

肆、意識形態的主要分歧

問題的癥結乃是在同一意識形態的規範下，為什麼會產生不同的路線、方針與政策？舒曼（Franz Schurmann）的解釋值得參考，舒曼認為每一種意識形態事實上包含兩個組成部分：一是純粹意識形態；一是實踐意識形態[12]。純粹意識形態是不變的，也是共產黨人的共識，它包括了馬列主義的歷史意識、階級概念、認知與評價能力、邏輯一致性，這些內涵並不隨時空的變遷而改變；至於實踐意識形態則是可變的，此種可變性，不僅造成了中共黨內的嚴重分歧，也造成了知識分子與中共在行動取向上的障礙。事實上，自國際共黨運動開始以來，共產黨人就陷於烏托幫與現實主義的兩種抉擇之間[13]。而 1921 年中共建黨以後，中國共產黨人也同樣的捲入類似的矛盾，這就是革命與社會主義的發展，究應如何實現。

誠如眾所皆知，馬列主義是一個無所不包的思想體系，它將革命與建設溶合在一個共同的外衣之內，傳到中國之後，成為中共的指導思想，然而，在中國的社會土壤中，它卻與中國傳統文化格格不入。因此，早期的中共黨員多數是在反中國封建傳統的歷史意識下，囫圇吞棗的吸收了馬列主義的革命理論，並且根據上述理論進行他們革中國傳統文化之命的行動。中共黨與政權的建立，可以說是馬列主義在東方的產物，並藉著特殊的環境與強有力政治風暴催生出來，他們的幸運之星是俄國的十月革命與日本的侵華戰爭[14]。

更重要的，中共革命的動力乃是一種對虛幻的美好社會制度的追求，中國共產黨人的齊心協力則奠基在對未來美景的憧憬上。然而，一旦落實到現實的革命和建設行動時，幻想不能代替實際，有的人失望了，企圖調整不合實際的理論，因而產生了修正主義；有的人則始終不渝地追尋那不能成真的幻想，成了教條主義。只是，不論是比較務實的修正主義者或僵化的教條主義者，兩者均面臨一個共同的困境，此即：馬列主義是他們唯一的精神泉源，也是他們藉以存在與掌權的合法基礎。不論是修正主義者或教條主義者，兩者都從同一個信仰、同一種理論出發，集合成一

---

[12] Franz Schurmann, *Ideoloqy and Orqanization in Communist China*. 2nd (ed.), rev.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0), pp.22-24。

[13] Richard Lowenthal, “Development vs. Utopia in Communist Policy”, in Chalmers Johnson (ed.), *Change in Communist Systems*. (stand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0), pp.33-116。

[14] 郭華倫，中共史論（第二冊）（臺北：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暨東亞研究所印行，民國 67 年 6 月 3 版），頁 1-224，文中詳細說明了自中共「八七會議」後，迄「遵義會議」前，中共黨內關於如何革命的路線分歧。

個政黨。這個依據馬列主義建立的政黨中，縱或對理論與實際解釋上常有不同，但是沒有任何共產黨人敢於拋棄共產主義，提出新的政治號召，究其原因，主要來自馬列主義理論的矛盾與衝突，也就是中共意識形態障礙的根源[15]。

基本上，促成馬列主義理論的矛盾與衝突，造成中共意識形態障礙的因素，主要有以下三點值得吾人特別予以重視：

馬列主義的侷限性：馬列主義是特定時代的產物，不可避免地有歷史侷限性，並不是「放諸四海皆準的真理」。因為任何意識形態都是特定時空的產物，適用於古者未必適用於今，適用於歐洲者未必適用於亞洲，適用於蘇聯者未必適用於中國，它必須隨著時空的推移受到信仰者的修正，以適應具體的歷史環境[16]。

因此，當馬列主義所描繪的社會藍圖在中國大陸實驗被證明此路不通後，也就是馬列主義這套信仰系統陷入矛盾與衝突之中，而不得不重新解釋這套信仰系統，其解釋方式，一方面在修正過時的論點，一方面則為現行政策提出合理化的理論依據。

文化大革命的衝擊：「文革」的慘痛經驗，導致「李一哲大字報」爭取體制內社會主義民主法制的出現，以及接踵而來的「天安門事件」反共抗暴的爆發，「北京之春」爭取自由、民主與人權的吶喊，「中國之春」海外民主運動的興起與大陸知識分子爭取學術自由的呼聲，使得中共領導人感覺到其政治系統的危機性，為了維持中共政治系統的生存與發展，馬列主義意識形態實有重新解釋的必要，否則中共就難以掙扎求變、救亡圖存。

由於此種情勢的演變，促使中共意識形態必須做相應的調適。於是中共將「文革」的一套說成是極「左」的，從而主張「開放思想、發揚民主」，以「實踐來檢驗真理」，鄧小平甚至強調不大大解放幹部和群眾思想，「四個現代化」就沒有希望[17]。

對外開放的衝擊：五十多年來，中共先是採用「自力更生」的做法，實行閉關自守的政策，反對資本主義的一切東西[18]。但是，自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決定將「四個現代化」作為主要的工作目標後，鑒於自身能力的不足，為了吸收外國的資金技術，中共不得不對外採取開放政策。

---

15 同註 7 書（下冊）。「歷史決議」承認，中共是在「十月革命」和「五四運動」的影響下產生的，然而，中共在「共產國際」的扶植下逐漸壯大；其次，日本侵華使中共得以坐大方面，毛澤東即曾在 1964 年 7 月 10 日告訴日本社會黨人：「沒有你們皇軍侵略大半個中國，中國人民就不能團結起來對付你們，中國共產黨就不能奪取政權。」

16 同註 4。

17 鄧小平，「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1978 年 12 月 13 日），同註 7，三中全會以來—重要文件選編（上冊），頁 22。

18 胡耀邦，「關於對外經濟關係問題」，同註 7，三中全會以來—重要文件選編（下冊），頁 1111。

然而，對外開放政策卻引起了對內的衝擊，知識分子普遍產生「三信危機」，帶來了意識形態合法性的挑戰，大陸人民對共產制度的不滿，迫使中共不得不在政策上具體讓步，但是，知識分子與大陸人民的要求遠遠不只於此，他們希望實行西方的自由制度來代替社會主義制度[19]。在一連串的衝擊之下，如何堅持其原來的意識形態，又不妨害其改革和開放政策的推進，重新解釋與發展馬列主義與毛澤東思想便成為中共唯一的選擇。

隨著中國大陸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經濟成分、利益團體、社會組織和社會生活方式日趨多樣化，人們的價值概念、價值取向也在變化，故中國大陸正處在改革和發展的關鍵時期，經濟關係和經濟利益進一步調整，給人們帶來了一些實施問題和思想困惑。如何在新的國際國內形勢下，進一步加強科學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教育，增強人們識別和抵制各種錯誤思潮的能力，進一步鞏固共產黨人的根本信仰和全國人民團結奮鬥的思想基礎[20]。特別是在全球化的新格局之下，中共意識形態的調適就成為當前中共刻不容緩的重要工程了。

伍、意識形態的調適做法

中共在中國大陸實踐社會主義的結果，不僅把大陸造成貧窮全落後和政治衰退的局面，而且使中共幹部與大陸知識分子對共產主義產生了嚴重的信仰危機。鄧小平為了挽救中共意識形態的危機，於是開展了重新詮釋意識形態的運動，企圖以變止亂，穩固政權，其具體的做法乃是由重新修正毛澤東思想與重新解釋馬列主義著手；而江澤民則為了因應新世紀中國大陸所面對的嚴峻的挑戰，企圖掌握前所未有的有利條件和大好機遇，不僅揭櫫政治改革的目標，包括安全社會主義民主制度、加強法制建設、推進機構改革、完善民主監督及維護安定團結五面向，而且還企圖扭轉中共固有的意識形態，促進中國共產黨的根本體質轉型[21]。它的指導原則歸納統稱為「三個代表」，並且不斷在各種重要場合的講話中反覆強調[22]。

綜合鄧小平與江澤民關於中共意識形態的調適，主要表現在以下四項重點中，此即：　對「階級鬥爭理論」的修正；　對「歷史唯物論」的修正；　對「理論與實際」的修正；　「三個代表」指導原則的提出。茲分別探討如後：

---

[19] 胡喬木，「當前思想戰線的若干問題」（1981 年 8 月 8 日），同前註書，頁 907。
[20] 中共中央黨校編寫組，「三個代表」學習讀本（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2001 年），頁 3-9。
[21] 傅岳邦，「新世紀中國共產黨體質轉型之展望」，共黨問題研究（臺北：第 27 卷第 12 期，民國 90 年 12 月），頁 39。
[22] 同註 20，頁 8-9。

對「階級鬥爭理論」的修正：階級鬥爭論是馬列主義的核心思想。毛澤東吸收了這個理論，把階級鬥爭看作「萬應靈藥」，用它來解釋所有的政治、經濟、文化、教育問題。毛澤東強調階級鬥爭的原意，是要以此來保證及規範社會主義的建設，避免受到資本主義的污染而腐蝕變質，但是結果卻導致政治對經濟的過度干涉，經濟生產在失去客觀規律的作用下自然大為低落，不僅使中國大陸充滿了連續不斷的政治運動，而且曾經使中共經濟瀕臨崩潰的邊緣。

鄧小平鑒於毛澤東「階級鬥爭為綱」造成的禍害，所以特別強調：「我們反對把階級鬥爭擴大化，不認為黨內有一個資產階級，也不認為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在確已消滅了剝削階級和剝削條件之後，還會產生一個資產階級或其他剝削階級」[23]。中共不僅批評毛澤東的「階級鬥爭擴大化」的觀點，而且認為毛澤東犯了下列主要錯誤：「錯誤的發動了對彭德懷的批判」、「錯誤的展開了反右派鬥爭」、「輕率地發動了大躍進運動和農村人民公社化運動」、「錯誤地提出整所謂『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以及「錯誤地發動大文化大革命」[24]。這就是中共對「階級鬥爭擴大化」給中國大陸帶來嚴重禍害的理論所做的修正。

對「歷史唯物論」的修正：歷史唯物論決定共黨社會的生產目的和方向，對它有什麼樣的理解，就會有什麼樣路線、方針和政策。按照馬克思的說法，生產力與生產關係構成社會的兩個方面，而生產關係是隨著生產力的發展而變化的。馬克思主要的論點是：「社會的生產關係，隨著物質的生產手段、生產力的變化及發展，也就被變化著、被改革著。」[25]馬克思的說法乃是「生產力決定論」觀點。然而毛澤東把馬克思所構思的生產力與生產關係做了修正，此即：當既存的生產關係不再能適應生產力的發展時，那就必須創造一個能促進生產力發展的新生產關係。這就是毛澤東所說的：「當著不變更生產關係，生產力就不能發展的時候，生產關係的變更就起了主要的決定的作用。」[26]毛澤東這種說法是把馬克思的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理論倒轉，是企圖經由人為的方式改變生產關係、提高生產力。「三面紅旗」是毛澤東以改變生產關係來決定生產力的具體表現，「文化大革命」更是如此，所謂「抓革命、促生產」，就是毛澤東強調生產關係決定生產力的著名術語。事實證明抓革命不但促不了生產反而生產大落，使中共經濟落後、貧窮，顯示毛澤東錯用了歷史唯物論。

鄧小平把原來被誤解和錯用的歷史唯物論修正過來，重新強調社會生產力決定

---

23 鄧小平，「堅持四項基本原則」，鄧小平文選（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年 7 月第 1 版），頁 155。
24 同註 7，頁 805-809。
25 馬克思，「僱傭勞動與資本」，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年），頁 198。
26 毛澤東，「矛盾論」，毛澤東選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0 年），頁 300。

生產關係，生產關係一定要適合生產力的性質。中共承認中國大陸在改革開放初期仍然是一個生產力水平較低，發展又不平衡的地方，在這種情形下，要發展生產力，必須改變原來的生產關係，使它能適合目前生產力較低的條件。於是有企業自主、權力下放、學習羅南經驗的提出，不僅強調以客觀經濟規律來代替主觀革命理論的說法，而且有多種經濟成分的同時並存。所以，中共經濟路線的改變和政策的調整，全都以對歷史唯物論的重新還原為基礎。

對「理論與實際」的修正：當馬列主義這套信仰系統，無法滿足中共幹部與大陸人民的需要及適應具體的歷史環境時，中共不得不重新解釋馬列主義，藉以調適中共意識形態所面對的「三信危機」、「共產主義渺茫論」和「社會主義異化論」，從而為中共意識形態尋找出路。

中共重新解釋馬列主義的重點是把它當做一種發展的學說，認為在過去一百多年中，它出現過停滯、倒退甚至變質。周揚在紀念馬克思一百週年的文章中，曾為這種說法提出註解，他認為馬克思主義既然是發展的，那麼對於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也就沒有固定的模式，所以他強調馬克思主義的發展，必須同各個國家、各個民族的歷史和實際相配合，而且必然要形成各自具有的馬克思主義的不同特色[27]。

1984 年 12 月 7 日，人民日報「理論與實際」一文，聲稱：「馬克思逝世已經一百零一年了，他的著作是百多年前寫的，有的是當時的設想，後來情況有了變化，有的設想不一定妥當，很多事情馬克思、恩格斯沒有經歷過，列寧也沒有經歷過，他們沒有接觸到，不能要求馬克思、列寧當時的著作解決我們當前所有的問題。……對馬克思主義不能採取教條主義的態度，時代在發展，新情況、新問題層出不窮，用馬列主義的某些論斷來框住豐富的現實生活，只能阻礙歷史前進，我們這些馬克思後代有義務在實踐中豐富和發展馬克思主義。」[28]同月 21 日，該報再發表一篇題為「再論理論與實際」的文章，重申馬克思主義不是教條，而是行動的指針的論點，並且指出：「馬克思主義曾經設想在社會主義社會條件下不需要商品和貨幣，而我們社會主義建設的實踐證明，社會主義社會不能沒有商品和貨幣，如果馬克思沒有講過的都不能做，那我們該怎麼辦？」[29]

綜合言之，當時中共重新解釋馬列主義的方式有以下三項：

第一、仍然強調馬列主義的「真理性」，但是也強調發展與堅持辯證關係的發展。

---

[27] 周揚，「關於馬克思主義的幾個理論問題的探討」，人民日報（北京），1984 年 12 月 7 日，第 1 版。
[28] 評論員，「理論與實際」，人民日報（北京），1984 年 12 月 7 日，第 1 版。
[29] 評論員，「再論理論與實際」，人民日報（北京），1984 年 12 月 21 日，第 1 版。

第二、把過去的失敗視為是對馬列主義的背離或教條主義的錯誤。

第三、強調當前的做法才是符合馬列主義又符合中國的「國情」，因此名之為「中國式的社會主義道路」。

「三個代表」指導原則的提出：江澤民將促進中國共產黨根本體質轉型的指導原則歸納統稱為「三個代表」，並且不斷在各種重要場合的講話中反覆強調。江澤民在慶祝中共建黨八十週年紀念會的講話中正式提出將「三個代表」思想定調為新世紀的建黨理論基礎。他將三個代表的內涵闡釋為：

黨始終代表中國先進社會生產力的發展要求（經濟面）。

黨始終代表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文化面）。

黨始終代表中國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社會面）[30]。

除了以「三個代表」思想為基礎，進行黨體質的轉型外，江澤民並認為民營科技企業的創業人員和技術人員、受聘於外資企業的管理技術人員、個體戶、私營企業主、仲介組織的從業人員、自由職業人員等社會階層，也是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建設者，應該把社會其他方面的優秀分子吸收到黨內來[31]。因此，中共做出以下重大承諾：

降低黨的門檻，吸納私營企業主入黨。吸納資本家，甚至港澳地區中國藉富豪入黨，使中共不僅以工農為對象，並且幾乎包括了社會各階層人士，成為真正的「全民政黨」。

宣告中國共產黨黨的性質的重大轉變：即從「革命黨」向「執政黨」轉變，從「計畫經濟的執政黨」向「市場經濟的執政黨」轉變[32]。

陸、結　　論

伊斯頓（D.Easton）認為：任何政治系統都受國內社會環境和國外社會環境的包圍與影響[33]。所以政治系統必須具有對環境的變動反應，並適應種種情勢的能力才能生存，也就是說政治系統應該有能力處理來自環境的種種影響。

基本上，政治系統對來自環境的種種刺激，只能做出兩種反應，此即：　適應（Adapting）；　調適（Adjusting）。中共政治系統在改革開放與面對新世紀全球化

---

[30] 詳見葉篤初、金曉鐘主編，「三個代表」讀本（北京：紅旗出版社，2001 年），頁 44-46、頁 63-64。轉引自詹中原，當代中國大陸政府與行政（臺北：神州圖書公司，2002 年），頁 6-12。

[31] 傅國湧，「黨員有批判領袖的權利」，開放（香港：第 177 期，2001 年），頁 36。

[32] 中央日報（臺北），民國 90 年 8 月 8 日，第 7 版。

[33] David Easton, *A Systems Analysis of Political Life* (New York: Wiley, 1965), p.23.

的歷史環境時，很明顯的採取了調適的作法，特別是對其建黨建政的根源的意識形態—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作出了重新解釋和提出指導原則的說法與做法。

任何政治系統都在變，沒有不變的政治系統。鄧小平透過對「階級鬥爭論」與「歷史唯物論」的修正，對「理論與實際」的重新解釋，調適了馬列主義意識形態的矛盾與衝突。一方面企圖維護馬列主義理論的權威，二方面又要維護中共統治的合法性，雖然取得了部分經濟改革的成果，但是事實上只是暫緩了「三信危機」全面爆發的時間而已。江澤民有鑑於此，乃進一步要求中共全黨同志和全國上下一定要高舉鄧小平理論偉大旗幟，全面貫徹落實「三個代表」要求。其目的就是要把「三個代表」思想最終成為中國共產黨在新時期的立黨之本、執政之基、力量之源[34]。

中共在中國大陸取得政權，自認是馬列主義革命，而且革命不排拒外來意識形態，但是它必須與當地文化相結合，否則它就只能以失敗告終[35]。對於中共意識形態的適應與調適，且讓吾人引用鄧小平「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作指標，放眼新世紀全球化大社會的新情勢，尋找認清並堅持適合中國人生存發展的光明大道。

---

[34] 楊建文，發展是執政興國的第一要務（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2 年 9 月第 1 版，序言），頁 3。
[35] 尹慶耀，共產主義在中國大陸的實驗（臺北：幼獅公司，民國 81 年 2 月 2 印，前言），頁 1。